

# 理論作為生命

## 悼念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盧曼

●湯志傑

「您所做的一切，盧曼先生，全是錯的，但都有品質。」據聞哈伯瑪斯在一個雙方都出席的訪談場合當著盧曼的面如是說。這則軼聞於盧曼去世的消息傳開後，又再度出現於報章的紀念文章中，大有為其蓋棺論定之勢。

然而，盧曼在社會學界的影響，事實上仍稱得上方興未艾，人們其實還無法因著他於十一月六日的去世——一個意識系統的終結，但同時卻也是社會系統中的一個事件——便評斷他一生的功過。因為光

是考慮到他仍有許多手稿未發表的情況下，現在要下個全面性的斷語，都還嫌早。所以，這句出自盧曼長期論敵的話，不過是透露出他的作品爭議性，但同時更呈現出，即便不是不同意他的立場的，也不能不肯定他的努力與份量。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當盧曼去世的消息十一日首度於北萊茵—西伐利亞邦的地方報紙披露後，當天的電視與廣播不僅立刻播報了這則新聞，相關的文化性節目還特別抽換，迅速推出回顧其一生的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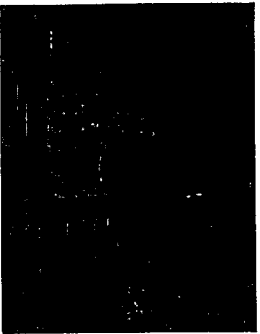
或紀念其逝世的專題，而隔天的德國各大報副刊，更是少不了紀念他



哈伯瑪斯(圖)當面對盧曼說：「您所做的一切，全是錯的，但都有品質。」

〈第三六期〉1998·12·1

理論作為生命



幼童時的盧曼常常隨母回娘家瑞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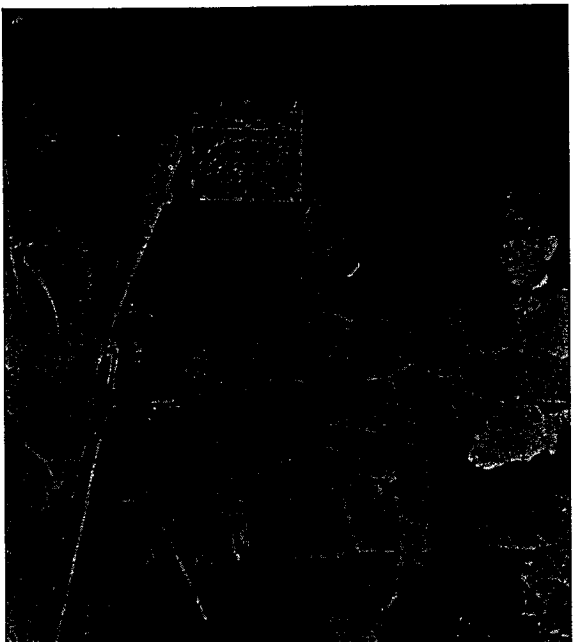
的文章。

### 從行政官僚到學界

然而，在這些備極哀榮的肯定幕後，這位戰後德國社會學理論界的冠冕其實有著十分曲折的學術生涯歷程。(註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他出生於下薩克森邦的呂內堡(Lüneburg)，雖然祖父會做過市參議員(Senator)，而在當地小有名氣，但並不是德國學界屢見不鮮的顯赫書香世家的出身。他父親從事的是自中世紀流傳下來的啤酒釀製業，並繼承了由他祖父所創

設的小釀製廠，但到父親的時代時，尤其是由於帝國稅法的關係，這個行業已很難在經濟上獲利，家道可算中落。他的母親則系出瑞士旅館業者。從他的雙親背景及家庭環境來說，可以說沒有任何學術方面上的遺贈。他只記得小時會好奇於父親為何緊盯著報上的一堆數字看，父親只跟他說那是股市行情，並丟下一句話：「股市不會撒謊。」

一九三八年前往瑞士旅遊尚未被禁止前，他常常在夏天隨著母親回娘家，這帶給他一些對比的經驗，也讓他體會到不同於德國的氣氛。例如在訪談中提到，他自己當時是反對佛朗哥的，可是他驚訝地發現，在德國，竟然所有的人都是支持佛朗哥的。在父親身為小企業主而對一切社會主義者不抱好感的情況下，全家與納粹(亦即國家社會主義)的關係也不佳。然而，由於盧曼跳級一年，所以在十五歲之齡時就得跟同學一般徵召擔任空軍的地勤助手(Luftwaffenhelfer)，投入二次大戰，之後並成為美國俘虜營的階下囚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而不是隨著德國戰敗便獲得釋放。



佛朗哥在德國與瑞士，明顯有不同看待。

訪談中提到戰時經驗說，兩個不幸墜落於呂內堡的英國駕駛員理當可以獲救，後來發現為人自後方擊斃。納粹極權統治垮台後原本以為一切便得以恢復秩序，但卻失望了，這尤其與他在俘虜營中遭到全然不同於國際慣例的對待的經驗有關，他意識到無法簡單地只以好／壞來評斷一個政權。這種社會情

CON-TEMPORARY

當代

境的極大轉折，一切都依舊，卻又都不一樣的情況，引起了他對於秩序問題的疑惑，並成為他戰後攻讀法律的一個動機。他日後孜孜於基本的社會理論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的工作也可溯源於對這個霍布斯秩序問題的關懷。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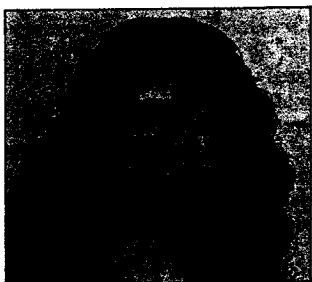
納粹垮台後，盧曼意識到無法用好／壞來評斷一個政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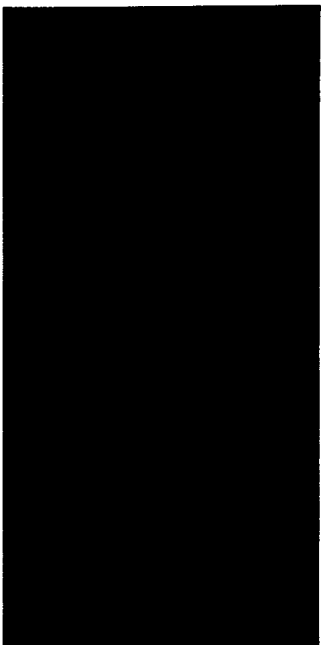
同以往的是，不是從統一出發，而是從差異出發，也不是以（和解這個意義下的）統一做結束，而母寧是終結於較好的差異罷了。對於差異的強調使得他的理論進路有著類似解構的色彩，然而他卻並不滿足於只是瓦解舊的差異或指出其弔

詭而已，而是要一併指出其中新舊遞移的理路來。

由於他高中的畢業文憑未獲承認，所以是在上了銜接性質的過渡課程後才正式於一九四六年就讀於大學的法律系。畢業後本打算當律師的，但是在國家考試及格後取得候補資格，而於小城市的律師事務所賺取三餐所需的麵包時，發現這行業有著諸多先在的限制，於是決定進入行政體系，他以為這裡擁有較大的自由空間。他起先服務於呂內堡的高等行政法院 (Oberverwaltungsgericht)，一年後下薩克森邦政權更迭，由CDU與DVP聯合執政，在調不出多餘的行政法官前往支援，而掌權者又不信任既



盧曼在哲學上攻讀笛卡爾 (右) 與胡塞爾 (左)。



當代

《第三六期》1998·12·1

理論作為生命

CON-TEMPORARY

有具SPD黨籍的官員的情況下，他被差遣前往邦首府漢諾威 (Hannover)，進入文化部 (Kultusministerium) 任職，負責納粹治下對人民侵害的賠償事宜。不意下次選舉時政權再次更迭，由於SPD中有人替他講話，才保住了差事。這段期間中，他已不打算以公務員為志業，每每利用五點下班後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並不斷建立他日後在德國社會學界廣為人知的卡片系統。他自言當時主要唸社會學與哲學方面的書籍，哲學方面尤其專注於笛卡兒與胡塞爾，(註二) 社會學則開始接觸早期的功能論，像馬凌諾斯基 (Malinowski) 及芮克利夫－布朗 (Radcliffe-Brown)，另外也看些文化人類學及民族學的東西，德國的哲學家類學則毫無興趣，此外還唸哈康德，但沒興趣碰黑格爾與馬克思。

### 以社會學的啟蒙為己任

就在經手相關業務的過程中，他發現一個在當時美國「新政」的背

景下，提供行政人員進修有關組織方面課程的獎學金的機會，其中並供兩個名額給德國人，於是便提出申請，並正式於一九六一年負責哈佛。獎學金設立機構所提供的課程，主要是有關國際政治策略方面，授課老師包括了國際政治學大師 Morgenthau 及季辛吉之流，不然便是有關總體經濟統計程序的課程，這都引不起他的興趣。反而是當時勢力仍如日中天的帕深思的社會學理論成為他當時主要的着力所在，而致力於學習帕氏理論建構的技術。不過，他感興趣的其實只是帕氏究竟是如何建構起這樣一個大理論的，以及，將在什麼地方遭致失敗——一旦倒塌的話。盧曼在訪談中提到，早在到哈佛前，他便已發展出自己的功能概念，並且與帕氏的觀點多有抵觸。他曾與之討論多次，但往往只得到帕氏一句典型的回答：「It fits quite nicely。」儘管盧曼自認由此所開展出的將是全然不一樣的東西。對他來說，功能並不取決於結構，而是依互相可取代的觀點而變。然而，由於這段淵源，加上許多詞彙上的沿用與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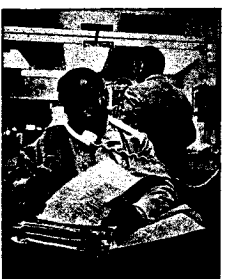
盧曼最早接觸的文化人數學是馬凌諾斯基 (圖) 的功能論。

上的類似性，當結構功能論從唯一的典範轉變成保守的代名詞，並成為理論及批判界的衆矢之的後，連帶地也使盧曼日後開始嶄露頭角時，自始便揹上了事實上與之不相關的保守罵名。

當盧曼在哈佛進修時，他想撰

寫的還不是社會理論方面的文章，而是對他自身公務員經驗進行反省的組織理論的書。他覺得當時多半以經濟的企業組織經驗為基礎所建立起來的組織理論，根本就不符合他在官場中親身經歷到的人際經驗。他這個興趣也起源甚早，在五〇

盧曼到哈佛原主攻國際政治，接觸到 Morgenthau 和季辛吉 (圖) 等人。



年代西蒙 (Herbert Simon) 發表 *Models of Man*，在德國學界仍未注意到這本書時，他自己便立刻找來看過了，西蒙所提的對於最適化的合理性構想的批判，他深感興趣。他進修的成果便是日後發表的《正式組織的功能與組織》(Funktio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 一書，日後並進一步發表了《目的概念系統合理性》(Zweckbegriff und Systemrationalität)。對他來說，組織不一定要有什麼目的，重點毋寧在於從內部來掌握組織。這也是日後他以決策 (Entscheidung) 為組織的構成元素，並在西蒙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決策與決策前提的關係，從而開展出他自己特有的組織理論的根源。

在這個擁有關於組織課程方面訓練的背景下，盧曼返德後進入 Speyer 行政高校任職。他在訪談中坦承，這時他壓根就還沒有當大學教授的念頭，不過想做個科學家罷了。但是，約略在一九六四年時，在一場盧曼赴 Dortmund 的社會研究中心發表《功能與因果性》(

Funktion und Kausalität) 一文的場合中，知名的社會學家 Holmut Schelsky 發掘了這匹良駒，

並細述手上籌設中的 Bielefeld 大學的計劃。於是，一年之內，在 Schelsky 的指導與幫忙下，盧曼分別交出了博士論文與教授資格論文 (Habilitation)，並獲得社會研究中心部門主管的職務作為過渡。這時，他才下定決心踏進社會學界。隨後，他跟隨 Schelsky 轉任 Bielefeld 大學，成為創校教授群之一，才算正式踏進學術的殿堂，不過這時他已三九歲了。就當時的標準來說算是很晚的了。起初他還有所猶豫，因為 Speyer 的環境還令他滿意。但 Schelsky 說動了他，因為他畢竟必須考慮在沒有博士頭銜的情況下在學界謀生不易。不過，最吸引他的恐怕還是身為社會學家的好處吧，因為如此一來，他什麼都可以做而毫無題目上的限制。只是他原先期望 Bielefeld 大學變成一個研究性質的大學終究未能實現，而 Schelsky 也在處於夾在官員與學生間兩面不是人的情況下，未幾即黯然離去。

《第一三六期》1998 · 12 · 1

理論作為生命

於簡單的看法，試著從他身上尋找互補性；後來的人所關注的才是如何建立起具有穩固基礎的理論本身。從他的眼光來看，哈伯瑪斯採取綜合式的取徑註定是無法獲得系統性成果的。

### 奠基在社會學三大支柱上

盧曼的崛起，或許有其戰後德國歷史處境的偶然，亦即除了整理古典大師的故籍與批判理論之外，理論界處於一片真空的狀態。不過，如果我們反過來從盧曼於一九九七年發表的《社會的社會》(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一書序言中的夫子自道來看，當他為自己擬下個不需任何經費援助的三十年長期研究計劃時，這幾乎便已預示了他終將有所成——如果計劃能實現的話。很明顯地，所謂掌握總體社會的社會理論才是他耗費畢生心力之所在，這也是他之所以在訪談中把一九八四年以前所發表的東西只看做準備工作，稱之為零系列 (Null-Serie)，而將當年的《社會系統》(Soziale Systeme



盧曼《社會學的哲學》書影。

一書視為第一本正式著作，並且是他整個社會理論研究計劃的導論而已。隨後我們便可看到他針對各個功能系統發表一系列有關社會理論的書籍：《社會的經濟》(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 《社會的社會》(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 《社會的法律》(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 《社會的藝術》(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 等，或許在他自知來日無多，並且為了兌現自己三十年規劃的承諾的情況之下，在其它可歸於此系列的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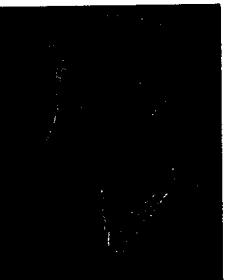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盧曼在 Münster 的 Wilhelm 大學法律

與國家科學學院所發表的就職演說中，明白地揭示以社會學的啟蒙為己任。但不同於批判理論以尋找規範基礎的代言人自居，從而獲得其特有的吸引力與限制，盧曼是以透過二階觀察而來的複雜性的化約及揭露更多的替代可能性的方式為之。(註三) 歷史的轉折出現於一九七一年，導火線則是一九六八年盧曼於德國社會學年會上發表《作為社會理論的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 als Gesellschaftstheorie) 一文。(註四) 吸引了哈伯瑪斯的學生的注意。之後哈伯瑪斯應其學生的要求，敦請盧曼前往法蘭克福參與課堂討論，最後則將兩人及學生的文章集結成書出版，這便是刊於一九七一年標題明顯偏向批判理論立場的《社會理論 vs. 社會工程學》及其附錄二本；系統理論與批判理論的長期爭霸自此展開。不過，盧曼自己在訪談中也提醒人們注意，對他的理論的接受應區分出兩個階段，起初來自左派人士，多半是不滿於批判理論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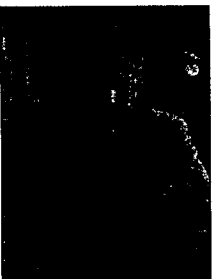
關手稿尚未出版前，(註五) 便先行於一九九七年推出兩巨冊的《社會的社會》，使得有關社會論寫作的導論、各論及總論各自具足。

但這也只是他所有著作中的一條軸線罷了，他同時還著有《社會結構與語意》(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系列文集四冊、《社會學的啟蒙》(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文集六冊，除此之外，他還處理過教育、象徵的溝通媒介、組織、大眾媒體、倫理與道德、信任、生態、風險、家庭、愛情等議題，可說是無所不談，而法律社會學更是他長期耕耘的園地。除了這種能夠以統一的概念及理論架構處理各式各樣的議題範圍，從而在各個領域都具有影響力之外，從理論上來看，盧曼最大的貢獻還是在於突破舊有的窠臼，使得理論的發展得以再往前推進。

對他來說，系統理論、演化理論及溝通理論是構築起繁實的社會理論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他的創新便是建立在隨時吸收各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將之融會貫通，然



盧曼的就職演說中，揭示以社會學為啟蒙的志業。



盧曼批評性的繼承帕森斯(圖)理論。

CON-TEMPORARY

當代

後再提出適於社會學的取徑的基礎上。舉例來說，盧曼在講授「系統理論導論」課時，便提到他在哈佛時對帕森斯“Action is system.”語印象深刻。(註六)據列於盧曼門牆之下，並在其退休後接任其教授職位的 Rudolf Stichweh 教授在課堂上表示，《社會系統》一書發表前，盧曼其實還在斟酌究竟是以行動還是溝通作為社會系統最基本的元素。不過，從後來所發表的《社會系統》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盧曼做出了以做為最基本的元素這樣的抉擇，而這相當程度上是受到由生物學家 Maturana 及 Varela 新發展出來的自我生產 (Autopoiesis) 的概念所啟發。行動因其較明確的不可逆及不對稱性而不適於作為能進行自我生產的元素，轉而成為歸因的問題。經此轉折，源自現象學、訊息理論、操控學及建構論的諸思想資源便似水到渠成一般，與社會學原有的理論觀點匯為一流。溝通不再視為是個訊息傳遞的過程，重點反而在於接收者的觀察與建構。再配備上懷海德 (Whitehead) 的事件概念

《第二六期》1998・12・1

理論作為生命

的系統的「自我生產」，才生產出他一篇篇的文章來：當他要寫某個特定主題時，便調出載有他認為與這議題相關的概念的卡片來，據此而組織成一篇文章。所以，他表示，卡片的寫作其實才是他整個寫作時間分配中的重心。

這樣的做法，其實也反映了盧曼對於從事理論研究的一個根本態度。他曾做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不能以船頭的神像來決定航行的方向，而是要靠羅盤。(註十)理論的工作絕不是對所謂的經典做些考古的工作，也不是將諸位大師的說法拼拼湊湊，弄出個千層派來；而是在前人提問的基礎上，以最新的工具來提出新的、適於現況的解決。因此，理論研究不但不應毫不理會所謂的經驗研究，反而應從中汲取養料，抽象成為更一般性的理論，以為做為進一步研究的反省。然而，三十年的呼籲與辛勤工作，卻換不來社會學界予以起碼的重視，在他生命即將告終之際，他終於開始有些按捺不住。在《社會的社會》一書中，一反他以往溫和、有時還稍帶幽默的語調，我們可以看到，他

，元素成了個時間化了的概念，自組織的系統理論走向自我生產的系統理論，從而帶來一個質上的跳躍。

### 迷宮的卡片系統

走筆至此，不能不附帶一提讓盧曼擁有如此巨大生產力的根源：他那總數不知有數萬或甚至數十萬，有如迷宮一般的卡片系統。(註七) Husserl, Spencer-Brown, von Foerster, Gunther, Glanville, Werner, Shannon, Bateson, Kant, Bertalanffy, Maturana, Varelan, Whitehead, Quine, Darwin, Spitz, Weick, Heide, Löfgren, Hofstadter, Ashby……等較明顯是其思想傳承來源的人名，想來都是他卡片上的常客；另外，從他廣泛引用的文獻來看，Simon, March, Olsen, Mead, White, Goffman, Serres, Girard, Heidegger, Prigogine, Peat, Eccle, Assmann, Piaget, W inograd, Rappaport, Bachelard, Bellah,

Koselleck, Nelson, Geertz, Polanyi, Douglas, Deleuze, de Man, Derrida, Tillich……這些各領域的重要作者應當也都在他的卡片系統中佔有一席之地。(註八)不過，刊於一九八八年 Spiegel 第二九期的訪談中他談到，比起哈伯瑪斯來說，他比較不是以作者為依據來建構的，而是根據觀念及議題來組織它的卡片系統。

同時，從他的註腳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各式的經驗研究成果應當也都被他一一歸檔了。除此之外，近代之前的著作在他也是信手拈來，他常喜歡提的一個說法是，在盧梭之前早就有盧梭主義了。對他來說，歷史學的二手著作只能當做是開胃小菜，真要進行研究，便必須面對一手的資料；而且，不能以盧梭之流的大家為主要的依據，反而必須根據當時二流或甚至三流的作者的作品，才能更貼近地建構出當時的實際情況。(註九)對他來說，卡片的主要功能是記載由別人作品所激發的自己的想法，而不在于於別人究竟說了什麼。也正是因此，透過這個以蛛網式互相連結著

對現在仍舊習於以人(而非溝通)為社會的組成元素，以地域的或所謂文化的界限(而不是溝通/非溝通)來界定社會的傳統做法，對社會系統自我指涉性質的不夠重視，不滿之情，在在溢於言表。在一九九七年發表的〈自組織與微觀歧異〉(Selbstorganisation und Mikrodiversität)一文中，(註十一)他也有點哀怨地開玩笑說，鉅觀/微觀這組區分大概是由「理論上不具有天份的美國人」所發明的吧。

### 系統理論的版圖才剛開始

儘管盧曼目前在德國社會學理論界幾乎是唯一的代表，不論是哈伯瑪斯或是後來以帕森斯傳人自居的 Richard Munch，在深度及廣度上都很難再挑戰他，(註十二)而《社會系統》這份專業的社會學理論期刊於一九九五年的創刊，更昭示了系統理論的地位愈趨鞏固，可是就如 H. U. Gumbrecht 刊於 Die Zeit (四八期)上面悼念盧曼的文章中替盧曼所抱不平的，放到世界的層次上來看，當人們談到德

盧曼的「理論做為激情」，是一個如實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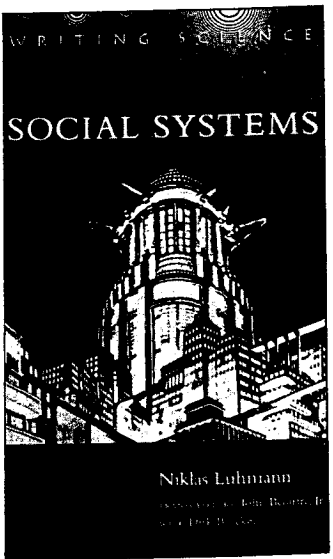
CON-TEMPORARY

當代

盧曼是大家，其理論已成經典。

國社會學理論時，想到的還是哈伯瑪斯。(註十三) Gumbrecht 認為造成盧曼不易為國際知識界所接受，或許是出於他不尋常地結合了僵硬的系統思考與相對化了的詮釋學的緣故。筆者自己的猜想則是，除了盧曼本身理論的高度複雜性及抽象性這個阻卻因素外，更大的原因可能在於人們還是較習於從行動的立場來思考，希望立刻得到一個簡單而明確的答案，以及偏好先以「政治正確」的方式選定了立場後，再來思考理論與推理的問題。盧曼對於帕森斯批判性的繼承，以及造成他聲譽雀起的與哈伯瑪斯的論戰，卻不幸地讓他自一開始就背上保守的標籤。(註十四)他不但甚少加以辯解，反而更指陳出進步/保守區分的陳舊與落伍，當人家向他要處方時，他卻慢條斯理地羅列出在既有的功能分化情況下的種種限制。這種寧可先進行深刻反省，無法讓人即學即用的不討喜做法，恐怕才是使多數人無法感受魅力的原因吧。

據聞，盧曼曾有次興沖沖地對同仁任教於 Bielefeld 大學，負責主



盧曼《社會學系統》  
英譯本。

編 Simmel 全集事宜的 Othein Rammsstedt 教授說：「我每晚只要喝上一小杯烈酒，便可以多工作上半個小時。」而他在訪談中也表示過，自己唯一覺得煩惱的事，大概就是時間不夠用吧。對他來說，寫作碰到滯礙之處時，解決之道就是寫另一篇作品。（註十五）如今，他是永遠再也無法使用時間了，但卻也再不會有時間不夠用的問題。就作為一位畢生致力於「冰冷的系統思考的理論家來說，他其實早已能安然面對死亡，因為一個自我生產的系統是很難事先想像自己的終結的。Gumbrecht 在上述文中便寫著，盧曼自己曾提到：「當人們處於我這樣的年紀，早晨醒來而不再感到任何痛苦時，人們便知道他死了。」他對科學工作嚴謹而一絲不苟的要求，對思想的徹底

性的堅持，以致往往給人「酷」的感覺。他自己在紀念 Schelsky 的篇章中也說到，Schelsky 便常向他問起：「在你那兒，人究竟要擺到那去？」（Wo bleibt bei Ihnen der Mensch?）（註十六）而希望他能多加進點人味，雖然說這與他實際生活中好好先生的形象其實大異其趣。

現在，連作為意識系統的物質基礎都消亡了，「盧曼」這個意識系統」的自我生產終於停下來了。但是，由「盧曼」這個意識系統」所引發的社會溝通，顯然卻不會就此結束。雖然說英語世界對他的接受度迄今為止仍然不高，不過，如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Carozo Law Review*,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New German Critique*, *Cultural Critique* 等知

名的期刊也都已經做過關於他的專號。同時，早年他或許必須忙於建構自己的理論大廈，而且孤身一人無暇開疆拓土，但現在他的學生輩已於這些年內陸續佔到教職，可以想像，系統理論的版圖才處於開要拓展的階段。至少，就盧曼所挑戰的傳統看法仍未全面崩塌之際，由他所提出的觀念，仍將不斷激發社會學理論界的科學溝通吧。

（註一）：或許是出於活生生的個人是社會系統的環境這樣一種理論上的堅持，以及從溝通理論來看，作者已死，重要的在於文本如何在實際的運作中

被銜接下去這樣的觀點，所以盧曼通常避談他個人的生命歷程，更不願讓人有什麼特殊事件或出身背景形塑了他思考內容的印象，以致於我們只能夠

從少數的訪談中拼湊出他的一些生命史過程。另外，筆者猜想這很可能也跟那些無意細究盧曼的理論進路，在理論上與之進行論辯的批評者動輒祭出

《第三六期》1998·12·1

理論作為生命

「這是你盧曼個人的觀察——」，「這是你的意識系統所建構出來的理論——」這種草率的反駁有關。個人的一個親身經歷是，一九九六年於 Bielefeld 大學召開的一個有關知識社會學及科學社會學的國際研討會中，盧曼受邀擔任 keynote speaker，那時他已是重病在身，在致歉過後本打算以坐著演講的方式為之，無奈場地設備一時無法配合，最後他是以靠著桌子的方式演說。不意接下來擔任講評的年輕英國學者一上台後便大談盧曼的理論中看不到人，看不到主體，看不到行動者等無數批評者早已彈過的老調，卻又未見新意。使得盧曼在回應時劈頭第一句話就說：「I am very unhappy。」才接著以他固有的緩慢、細微但卻又十分堅持的語氣徐徐展開他的答辯。下述有關其生平敘述，主要參考下列文獻，茲不再一一贅引：Niklas Luhmann, 1987: *Ar-chimedes und Wir*. Inter-

views, Berlin: Merve, 尤其 *views*, Berlin: Merve, 尤其是 *Biographie, Attitude, Zettelkasten* 一文。Detlef Horster, 1997: *Niklas Luhmann*, München: C. H. Beck, 尤其是 *Biographie im Interview* 一章。

（註二）：不過盧曼對於胡塞爾的興趣起源甚早，在另一個訪談中他表示，他大學時代便著迷於胡塞爾，並擁有「危機」文貝爾格勒版的手稿。他卡片系統的建立也早在任公務員前便開始了。

（註三）：就職演說的題目便是「社會學的啟蒙」（*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現收於同樣以此為名的書系第一冊之中，由 Westdeutscher Verlag 於 Opladen 出版。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讀者，也可以進一步參閱顧忠華／湯志傑，一九九六，〈社會學如何啟蒙？——評介盧曼的理論發展〉，收於黃瑞祺編，〈歐洲社會理論〉，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註四）：後改以「作為穩體社會分析形式的現代系統理論」（*Moderne Systemtheorien als Form gesamtgesellschaftlicher Analyse*）之名，收於他與哈伯瑪斯論戰的文集中作為導言。J. Habermas / N. Luhmann, 1971: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Frankfurt: Suhrkamp. 關於兩人的論戰，本文不擬細究，意者請參見顧忠華，一九九〇，〈溝通行動理論與系統理論〉，收於《中國社會學刊》第十四期；盧政春，一九九二，〈當代社會學系統理論大師：尼可拉斯·盧曼〉，收於葉啟政編，〈當代社會思想巨擘〉，台北：正中。盧曼另外還在訪談中談到，在這之前，當法蘭克福大學罷工時，他便會代理阿多諾講座一職。

（註五）：筆者手邊便有《社會的政治》與《社會的宗教》兩份手稿，另外據信可能還有像「社會的組織」類的遺稿。這

當代

CON-TEMPORARY

些草稿在一九九五年時可說就已具備可出版的雛形了，如果盧曼不想再更動內文的話，只需補齊一些註腳及文獻徵引，便可出版了。

(註六)：此一授課錄音已由海德堡的Carl-Auer-Systeme出版社於一九九二年出版，共十四卷。另同家出版社還於一九九三年出版了同為十四卷的「社會理論」授課錄音。此外，到他逝世前，已有兩到三本的《盧曼字典》出版了。這種在生前便有課堂筆記(錄音)與專門詞典出版，恐怕也創下學界的一項新記錄。由此也可看出盧曼身為社會學大師的地位在生前便已獲得肯定。

(註七)：這也是許多訪談中一再出現的主題。相關的報導參見施尼Archimedes und Wir一書中的相關部份，及Niklas Luhmann, 1992: Kommunikation mit Zettelkasten: Ein Erfahrungsbericht, in: Niklas Luhmann, Universität als Milieu,

Bielefeld: Haux.

(註八)：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所謂的古典大師通常都是盧曼抓來當做箭靶，據以往前進的對象，韋伯大概算是較少被批評的例外。另外他也很少引用同時代德國人的著作，反倒喜歡徵引法國人的作品。不過，筆者個人推想，這可能跟文人相輕或厚彼薄此等等的做法無關，而是反映了德國戰後思想界的活力的確不如以往。

(註九)：參見Niklas Luhmann, 1994: Ansprüche an historische Soziologie, 收於Soziologische Revue 17: 259-264。

(註十)：參見Niklas Luhmann, 1983: Insistence on Systems Theory: Perspectives from Germany - An Essay, 收於Social Forces 61, 4: 987-998。

(註十一)：收於Soziale System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sche Theorie, 一九九七年第一冊，頁三三-三三二。

。中文出自頁三〇。

(註十二)事實上，與哈伯瑪斯的論爭可說已經過去。新一代的理論工作者比較感興趣的，是系統理論與德希達或拉稱的解構陣營的差異。例如Günther Teubner, Des Königs viele Leiber. Die Selbstdekonstruktion der Hierarchie des Rechts; Urs Stähle, Der Code als leerer Signifikant? Diskurstheoretische Beobachtungen; Marcus Hahn, Vom Kopfstand des Phonoyentismus auf den Brettern der Systemtheorie oder: Luhmann und \ oder Derrida-einfach eine Entscheidung? 中文皆收於Soziale Systeme, 一九九六年第二二期。Peter Fuchs, 1995: Die Umsch irft, Frankfurt: Suhrkamp. Henk de Berg & Matthias Prangel (eds.), 1995: Differenzen: Systemtheorie zwischen Dekonstruktion und Kon-

《第三六四》1998・12・1

當代

理論作為生命

CON-TEMPORARY

struktivismus, Tübingen: Francke.-Drucilla Cornell, 1996: Enabling Paradoxes: Gender Difference and Systems Theory, 收於New Literary History: 185-97。另外

還可以參考盧曼自己的文章：Niklas Luhmann, Deconstruction as Second-Order Observing, 收於New Literary History, 24: 763-782。以及Sthenographie und Euryalistik, 收於H. U. Gumbrecht & K. L. Pfeifer於一九九一年所編的Paradoxien. Disson anzen, Zusammenbrüche. Situation offener Epistemologie 一書中，頁58-82。Frankfurt: Suhrkamp。

(註十三)：另外可以參考Arthur J. Jacobson, 1995: Habermas and Luhmann in the American Legal Tradition一文，收於Rechtshistorisches Journal 14: 3-12。文中還一併比較了德希達

在英語文獻中被引用的次數。對德希達及哈伯瑪斯的徵引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轉折點，之後便急劇上升，但是對於盧曼的引用，則始終維持平緩的上升而已。

(註十四)：在此，或可舉一例證明盧曼未必是如人印象中的保守，或者應該說對他來說重點在於問題何在，以及如何解決，而不是立場激進或保守的問題。在前面引到的Deconstruction as Second-Order Observing一文中，盧曼便提到，他在美國湊巧聽到正在討論因為性侵犯而來的在軍中禁止男同性戀者服役的問題。他說，這種做法背後的動力可能出於人們對控制自己的身體不具信心。因為軍中同樣有女性官兵或雇員，同樣也發生過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卻沒有人會因此而禁止異性同時在軍中服役。所以，恐懼的來源其實在於同性赤裸軀體頻繁面對面接觸的可能性，而不在于愛滋病更不在於性傾向。另外，盧

曼在訪談中也提到，他對政治或政黨其實沒什麼特定的偏好，而且在六〇年代時還一度跟SPD走得比較近。只是以他自己的經驗來說，他覺得政治對於科學家的限制太多，而且往往看不到結構性的替代方案，因此他寧可讓自己聘馳在較大的可能性空間中。

(註十五)：對這位辛勤的理論工作者來說，人們獻給他六十歲祝壽文集的標題「理論作為一種激情」(Theorie als Passion)或許是恰如其份的描述。如今，他的一生已告結束，或許我們改用「把理論當做生命」(Leben als Theorie)來描繪他的一生。

(註十六)：Niklas Luhmann, Helmut Schelsky zum Gedenken, 收於上面Universität als Milieu一書中，引文出自頁四九。原發表於Zeitschrift für Rechtssoziologie 5(1985):1-3。